

課程研究與文化研究的跨界連結

楊洲松

本文旨在藉由理論分析方式，論證課程研究跨界與聯結文化研究之可能性。本文認為，課程研究不囿於任一理論或方法，可以跨界聯結各種理論、方法與領域。跨界與連結到文化研究，或是將文化研究領域理解為課程研究領域，可使課程研究領域不囿於單一領域，諸如媒體素養教育、青少年次文化研究等，也都可以是課程研究的範疇；除此之外，1990年代以來的文化研究所著重主題如：認同、種族等也可作為課程研究領域的補充，課程研究者未來更能加以擴展至該領域之研究。總之，課程作為教育學核心領域知識，其研究工作不僅是在固有之學科邊界與疆域中進行強化、修正與捍衛而已，而是能跨出學科邊界，接合課程領域之外的不同研究觀點、理論與方法，且文化研究會是課程研究跨界聯結的極佳場域。

關鍵字：課程研究、文化研究、跨界連結、理解課程、再概念化

作者現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教授

通訊作者：楊洲松，e-mail: zsyang@ncnu.edu.tw

主題文章

課程領域經過一段時間的沈寂，現在已經非常活躍。確實，該領域的學術文獻已出現了一種名符其實的「爆炸」。而且，我們用以理解當代課程文獻的主要範疇，在有些情況下呈現出日益增加的跨越學科邊界的特性。-- Pinar、Reynolds、Slattery 和 Taubman (1995, p. xiv)

壹、前言

1970 年以前的課程領域為課程發展典範，主要以 Ralph Tyler 在 1949 年出版的《課程與教學的基本原理》(Basic Principle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為代表；其基於技術理性的直線思維，尋求可普遍性的、可計算性的、與可控性的「泰勒原則」(The Tyler Rationale) 成為主導課程設計與發展的主要典範，其後諸種課程發展模式也幾乎以此典範的核心綱領為基礎，進行強化、擴展與維護工作而已。

然而，自從 William Pinar 所主張的維持課程秩序並將之組織得井井有條視為專業活動的主要動機所處的課程發展 (curriculum development) 時代已經過去，取而代之的課程研究應該是「理解課程」(understanding curriculum) (Pinar et al., 1995)，課程研究可謂因此產生了「典範革命」(revolution of paradigm)。Pinar 將新的課程研究典範稱之為「再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主張課程領域不再是著重於課程目標的擬定、課程內容的組織、教學方式的選擇與評量方法的適切，而是將課程理解為一種符號再現 (symbolic representation)，意指那些制度性與論述實踐、結構、形象及經驗可以用不同方式被確認和分析，這些方式包括政治的、種族的、自傳的、現象學的、神學的、國際的、性別的、解構的等不同取向，這也形成了 Pinar 等人所編寫的巨著《理解課程》(Understanding Curriculum, 1995) 一書。

Pinar 等人的努力，不僅是編寫了一本有關課程研究的大部頭教科書而已，其更開展了課程研究的另一典範領域，從理論觀點、研究方法、研究範圍、研究應用等諸多層面讓課程研究跨界並聯結到了當代重要的理論、觀點與方法；同時也將課程研究從教育學領域中大步跨出，聯結到教育之外的更大的政治、經濟、社會、宗教、文化、區域與全球的脈絡。

臺灣課程研究長期以來幾乎都是以 Pinar 所批判的「課程發展」的典範模

式，遵從泰勒原則的典範，並逐漸興盛為教育學科中的顯學¹。雖然早在 1980 年代陳伯璋出版的《潛在課程》一書，即標示了臺灣課程研究再概念化的興起。但嚴格說來，近 20 年來之課程改革，基本上仍然是依循課程發展的典範，在典範的框架界限中修修改改²，雖然有許多批判與質疑的左派聲音，但多限於論述層面，在制度改革層面，仍是右派的「教育的『正確』(right)之路」起著主導性作用。而課程研究也多圍繞著課程發展典範展開，諸多改革與研究僅是在既定框架中進行，功能在強化、補足、裝飾典範核心而已。

近年來，課程研究學者嘗試開始跨界連結，最典型的即為「課程美學」研究³。透過讀書會、演講、研討會與出版刊物的形式，一批課程研究者跨出課程學科界限，「接合」(articulate) 美學研究，其不僅在研究主題跨界連結，也在參與研究者上跨界連結，接合了課程、教育哲學、美學等領域學者，共同嘗試為課程研究開創新的空間、尋找未來的新願景。該行動的具體成果早在 2005 年 4 月《課程與教學季刊》中即首次以「課程美學」為專題發表；2006 年，周淑卿與陳伯璋等人開始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下進行課程美學的相關研究；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亦在博士班首開「課程美學研究」之課程。其後與「課程美學」相關的碩士、博士論文與期刊文章逐漸增加，為「課程美學」的研究注入豐沛能量。2012 年，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出版以課程美學

¹ 以教育學術研究而言，近 20 年來臺灣課程研究的發展可謂蒸蒸日上、興盛蓬勃，與教育行政研究可謂當前教育研究之顯學。除了幾乎所有原師範體系之大學設有課程研究所外，連有教育學科之一般大學亦多設有課程研究所，如中正大學課程研究所（將於 103 學年度起併入教育學研究所）、暨南大學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而就學術活動而言，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成立已 15 年，「課程與教學論壇」每年兩次，迄 2014 年中已舉辦 30 屆。除此之外，期刊也可作為學科發展之指標，以《課程與教學季刊》而言，其屬 TSSCI 期刊，一年可以出到四期，可見其稿量之多，凸顯學術人口之眾。

² 臺灣課程研究與教育改革有許多左派的、批判性的論述，但僅止於論述提倡。真正到了制度改革部分，起著主導性功能的仍是右派的「教育的『正確』之路」。

³ 2009 年起，歐用生與陳伯璋等研究者在國家教育研究院支持下，進行「美學取向課程與教學之理論建構與應用」的三年研究。其形式包含讀書會、研討會，採取了 Eisner、Greene、Doll 等藝術鑑賞、存在主義、後現代主義等之觀點，援引詩歌、文學、電影、戲劇、音樂、舞蹈等藝術素材進入課程研究領域，開展出課程美學的研究。具體的口號則為：「教育是慢的藝術」、「減法的教育」等。

主題文章

為題的專書，顯示這研究主題似已逐漸發展成形（周淑卿，2012）。此後持續進行與課程美學相關經典的研讀討論會及美學理論的專題演講聚集不少對此課題有興趣的學者及研究生，催生了課程美學的研究社群。

其實，早在 1992 年，批判教育學者 Henry Giroux 也採用了「跨越邊界」（border crossings）為題，撰述了《跨越邊界：文化工作者與教育政治學》（*Border Crossings: Cultural Workers and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一書，闡釋了教育學跨界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在該書中，Giroux 嘗試課程研究「跨界」並「接合」文化研究，而提出了一種「邊界教育學」（border pedagogy）的教育論述，據此開展出其後他與 Peter McLaren、Douglas Kellner、Rhonda Hammer 等批判教育學者共同提倡的教育研究新興議題與領域，包括了流行文化、媒體文化與青少年次文化等。

Giroux 等人所接合的文化研究，係 20 世紀 60 年代興起之學術論述，其無論是理論觀點、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圍主題等，都呈顯出一種跨界的特質，不囿於既定學科領域、方法典範或專門主題的界限，反而更能豐富研究內涵，因此自 20 世紀 80 年代後逐漸成為西方學術研究之顯學，影響力擴及人類學、社會學、歷史、文學、性別研究、族群認同、政治研究，大眾傳播及教育等。而從教育的觀點看來，文化研究重視文化、知識與權力間關係以及重視諸多方面的議題如：性別、流行、文本、階級等也都可以提供教育者一種批判性的語言來檢視教育中的意識型態與政治利益。經由文化研究的觀點，教育將是一種文化實踐，必須透過對歷史、政治、權力、文化的思考才能夠被理解（Giroux, 1997）。

基於上述，本文擬闡釋文化研究的發展與特色，論述其與課程研究可能之跨界聯結，進一步思考其在課程領域所可能開展之研究視野與領域，提供課程研究理論與實務之參考。

貳、文化研究的發展與特色

Readings（1996）曾經指出，1990 年代以來，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發展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與進展，迄今已經滲透到各個人文學科的領域之中，包含人類學、社會學、歷史、文學、性別研究、族群認同，甚至大眾傳播與教育等。同時，文化研究的思潮也廣泛地傳播到許多國家與地區如：歐洲、加拿大、非洲、拉丁美洲、美國、澳洲，甚至臺灣。其結合了不同領域的知識份子挑戰了傳統上對於文化、權力及政治間關係的理解（Giroux, 1997）。

文化研究在英國與美國有著不同的發展，美國的文化研究主要是著重於傳播研究，尤其是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英國的文化研究的開端主要是

由三位學者的四本重要著作所開啟：Richard Hoggart《文化素養的運用》(The Uses of Literacy, 1957)、Raymond Williams《文化與社會》(Culture & Society, 1958)、E. P. Thompson的《英國勞工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這也構成了 CCCS(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簡稱 CCCS), 此中心也的確如其名所示地, 成為當代文化研究的重鎮。

CCCS 早期的學者 Hoggart、Williams 與 Thompson 等人係以左派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批判了源自於英國傳統文化菁英主義的文化概念與理論。尤其是 Williams 在《漫長的革命》(A Long Revolution, 1961)一書中對於文化概念的歷史檢視, 之後提出「文化是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的經典定義, 重新定義與理解文化概念, 將從屬於精英階級的文化概念解放為所有人日常生活中可能的、獨特的生活方式, 因此「任何事物」都可以是文化, 當然也是文化研究的對象, 而開啟了「文化主義」(culturalism)的文化研究路線, 賦予了文化更多元的意義與更多樣的面貌(楊洲松, 2004、2014)。

1964年, CCCS 在成立不久後的報告書中就指出, 其研究的領域包含三個: 「歷史與哲學的」研究, 其關注當代文化與社會變遷的論辯, 去了解主要運動的理念、起源與互動、以及對社會的影響; 其次則是「文學與藝術的社會學」, 希望發展一種批判性的語言來解釋藝術與社會相互影響的現象, 因此會帶入文學批評、社會學、社會心理學與社會史等學科理論; 第三則是「批判的—評價的」研究, 對於大眾藝術、流行文化與大眾媒體等進行深入的研究, 以了解大眾藝術或流行文化如何達成其影響(Gray, 2007)。

上述三個研究領域中, 對後來影響較大的即是第三個有關於大眾藝術、流行文化與大眾媒體的批判性研究。尤其是 1970 年代 CCCS 援引了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 Gramsci「霸權」⁴(hegemony)的理論觀點, 對於大眾媒體、流行文化與青少年次文化等的研究, 更進一步文拓展了化研究的主题範圍並深化了文化研究在當代諸領域的影響層面。例如, 藉由霸權中的「收編」(incorporation)及「反抗」(resistance)動態平衡的概念, 1970 年代的 CCCS 於青少年次文化的研究上有了極為豐碩的成果。在《通過儀式的反抗》(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Hall & Jefferson, 1975)一書中, 他們就指出了青少年離經叛道的生活方式與

⁴ Gramsci 提出了一種關於文化、權力與霸權的理論, 重新定義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主宰與從屬階級間維持關係的原則。對 Gramsci 而言, 統治階層的控制並不是由官方力量之使用, 而是透過「霸權領導的鬥爭」去贏得從屬階級對於既存社會秩序的共識。

主題文章

行為風格其實是對於更大範圍的工人階級「母文化」內部的矛盾和緊張的一種意識型態的解決方式。1977年Paul Willis的《學習成為勞工》(Learning to Labour)則是CCCS在次文化研究上一個重要的經典性研究，他採用人類學「俗民誌」(ethnography)的方式，針對勞工階級的青少年如何又會得到勞工階級的工作，提出了不同於傳統馬克斯主義者如Bowles與Gintis在《資本主義美國的學校教育》(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1976)所謂資本主義下的學校教育是階級再製工廠的觀點，指出了青少年自我認同與反抗意識的主動性。Willis的研究對於文化研究擴展其方法論與研究範圍有相當大的貢獻，並影響到了教育社會學對於青少年次文化的研究。另外的研究成果如Hebdige《次文化：風格的意義》(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1979)也指出，青少年次文化是一種反叛文化，可說是對於主流文化將世界事實「自然化」或「正常化」為世界形象的一種反叛。而對於青少年反抗文化所形成的社會現象與問題，尤其是引起的「道德恐慌」(moral panics)，CCCS的研究者注意到了媒體在這其中所扮演角色，而逐漸轉向了媒體研究。在《危機的監控》(Policing the Crisis) (Hall, 1978)一書中，他們就指出，道德恐慌其實並非是對於實際現狀的恐慌，而是有權者、媒體與專家們才是道德恐慌的始作俑者，他們對於某人、某事或某物的恐慌遠超過了其所可能真正造成的威脅。

文化研究在1990年左右進一步接合了後殖民研究、認同研究、性別研究與後結構主義等。其研究觀點也往往對於某些界線的排他權力表示懷疑，例如西方思想中起著主導作用的二元對立：男/女、南/北、中心/邊緣、高雅文化/低級文化、西方/非西方、異性的/同性的等文化現象(Readings, 1996)。進入21世紀後，文化研究的理論、實踐與研究方法歷經數十年的努力，已經拓展、滲透到了各個學門或學科之中，其且也已經散佈在許多國家或地區的學術研究之中；也因此反而使得文化研究獲得更多的養分與成長，邁向了「新文化研究」(new cultural studies)的取向；尤其是擴展到網際文化(cyberculture)、數位媒體(digital media)等較屬於年輕世代的文化；其也進一步接合了「解構」(deconstruction)、「後馬克思主義」(post-Maxism)、「後人類」(post-humanities)等理論，以及像Gilles Deleuze、Slavoj Zizek等理論家的學說，文化研究之未來仍大有可為並值得期待(Hall & Birchall, 2006)。

至於文化研究的特色則可以Grossberg在〈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what's in a name (on more time), 2009)一文中所歸納的六個特點來加以說明：文化研究是具學科性的、文化研究是具脈絡性的、文化研究是具理論性的、文化研究是具政治性的、文化研究是具科際性的、文化研究是具反思性的。

就文化研究具有學科性質而言，文化研究雖然同意多元觀點的(multi-perspective)研究取向，但這並不代表文化研究是個鬆散的大雜燴，其

仍強調研究本身需要具有嚴謹的經驗方法作為基礎，研究者本身也必須受過嚴謹的學術訓練，文化研究本身即具有前述第三點所謂理論架構的性質。其次，文化研究強調脈絡性。對文化研究而言，實踐與建構實踐的脈絡是無法分離的，脈絡不僅是背景，還是事物的可能性條件。文化、文化文本與文化實踐的概念，權力概念與其所建構的面向—種族、性別、階級、族群、世代等，甚至是文化與權力的關係，都是研究的獨特脈絡。而就文化研究具有政治性而言，其承諾生產協助人們理解世界處於變遷中以及如何改變的一些方向的知識。另外，文化研究是一個交叉學科的、跨領域的、有時是反學科的領域；因此文化研究致力於研究一種社會的藝術、信仰、體制和實踐的整個領域，這種工作必須同時以產生政治差異為目的。準此，文化研究本質上是許多不同的、超越學門界線的科際性學術活動。科際性意味著文化研究是智識活動的前沿，會去追求新問題、新模式、與研究的新方式。最後，Grossberg 認為「自我反思」(self-reflective) 是文化研究最重要的特色，因為在進行文化研究之時，分析總是參與、形成與脈絡之中。這會牽涉到認同的問題、政治立場的問題、反省個人與定位（楊洲松，2014；Grossberg, 2009）。

參、文化研究為教育之用

Giroux（2009）曾經指出，文化研究可以作為教育者教導學生如何看待媒體、分析閱聽人反應、挑戰既定學科界限、批判性地投入流行文化、生產批判性知識等的資源；或者是使用文化研究去改革課程與挑戰公共學校與高等教育中的學科形構。文化研究在協助教育者重新去思考諸如：教學與知識本質、學校教育的目標，學校如何受到更大的社會力量所影響等問題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在主流的文化研究領域中，教育學研究卻是缺席的。Giroux（1994）認為，文化研究中忽略了教育學研究的可能答案有二：

- 一、文化研究理論學者拒絕將學校教育看做是一個嚴肅性的文化鬥爭場所，或者是他們拒絕去證明傳統教育如何生產出特別的社會歷史，以及學校教育如何透過主流立場去建構學生的認同。
- 二、教育學通常被認為是不值得成為一門嚴格的學門主題。文化研究學者甚至認為，流行文化都還比教育學更具可信度。因此，教育學就在文化研究的文本中缺席了。

但一個具有批判性的文化研究必須也是追求教育、倫理及政治的目的。事實上，CCCS 的早期發展即與成人教育緊密關聯，幾位重要代表人物都從「空中大學」(Open University) 的成人教育起家，他們許多重要的論著也都是作為

主題文章

空中大學成人教育所需而生。可以說，教育活動在某種程度上提供了文化研究崛起與茁壯的重要背景因素。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作為研究領域，可以提供給教育研究許多重要的觀點（Giroux, 2009）：

- 一、文化研究可以提供知識與權威的形式，以理解是哪些東西持續製造及社會化了人們的生活。文化研究透過連結不同的倫理學與政治學而開展了一種可能性，可以定義及提供機構空間與實踐去教育教師、學生及他者在更新的公民生活中扮演主動的角色，以重新定義他們的角色為公共的知識份子。
- 二、文化研究具有徹底的脈絡性，而要求其在每個脈絡中要有改變。對教育者而言，教育產出於許多處於不平等權力關係中的不同團體的鬥爭之間；準此，教育總是具有脈絡性。特定脈絡中的歷史、文化、社會及經濟力量，會產生限制或提供可能性給學校教育。在這種脈絡性的思考下，文化研究可以提供教師與其他文化工作者瞭解學生帶到學校與其他教育場所之文化資源；同時也可以借此肯定及批判地將這些文化資源看成是學生作為生產他們的地方意識、歷史，及如何看待與他人關係等的知識形式的來源工具。
- 三、文化研究強調「科際性」。這可以提供一個理據以挑戰與質疑知識如何被生產化、階層化，及用來提出權威與排除的特別形式；另外也可以作為促使教師與學生提出外於官方認定之知識邊緣的新的分析問題與模式的背景知識。
- 四、文化研究廣泛地研究文化實踐，而開展了理解在發達工業社會中已經成為基本教育力量的媒體文化。因此，教育必須更具回應性地研究不同流行文本的生產、接收與位置運用；以及其如何建構社會關係、價值、特殊的社群觀念、未來、以及不同定義等。文本不再僅是指印刷文本或書本科技，而是所有那些知識的影音與電子形式。準此，教育要能提供條件給青少年與成人去運用流行、媒體及大眾文化以作為社會分析的對象並學習如何透過理解、從事與轉移的特殊策略進行批判性地解讀。學生必須成為文化生產者，也就是說，他們必須學習使用新的電子科技以學習如何建構權力分享的不同文化範疇。
- 五、文化研究也正確地認為，分析歷史的重要性並不是要將歷史視為一種不被質疑的進步觀整體敘述，而是一系列的碎片與取代。歷史成為解中心的、更複雜的、散佈的。歷史不是狹隘地被定義為西方歷史，教師可以提出多樣的傳統與敘述。這種取向的教育學優點是使那些在主流歷史中被排除與邊緣化的敘述、局部歷史與被征服的記憶成為可能。經由文化研究

的觀點，歷史可以從超國家與交互文化的觀點來解讀。歷史並不是人工製品，而是對於再現與作用力間關係的鬥爭。換句話說，歷史不僅是關於事實、資料及事件，其還有關批判性地檢視個人在權力、特權或從屬間關係的歷史定位。

- 六、教育的議題逐漸地成為一種定義文化研究的原則。經由文化研究，教育再現了文化生產與鬥爭的形式，並批判地注意到權力與意義如何被運用在知識、慾望、價值與認同的建構與組織之上。準此，教育不該被化約為技術或技術的精熟，而必須定義為一種倫理與政治考量的文化實踐。廣義而言，批判教育學提供了學生與他者—官方所認可之外的—歷史地與脈絡地獨特知識、技術與工具以增加參與公共生活的可能性。
- 七、若是文化研究理論學者真心關注現代世界中的文化如何成為權力的重要場所，他們就會嚴肅地處理教育如何作用於保證及挑戰權力在傳統論述及權力機制之中與之外的運用及反抗，並且認為教育與其他文化者應該扮演一個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就在於其提出了建立與鬥爭可以生產公共知識份子的機構與實踐空間。

基於前述，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些方法與工具以去批判性地解讀當代文化。文化研究從早期的歷史研究轉向意識型態研究，聚焦於種族、性別與階級等再現的意識型態批判，有助闡明文化如何複製階級、社會群體或不同的生活風格，進而肯定了不同文化型態與群體的價值，而賦權受壓迫與邊緣發出屬於自身的價值與重要性的聲音。文化研究因而促進了一種多元文化主義的政治學及媒體教育學，目的在於使人們感受到權力與宰制關係如何在像是電視及電影的文化文本中「被編碼」。其也描寫了人們如何可以反抗宰制的編碼意義並生產其自己的批判及另類的解讀。文化研究也可以顯示出媒體文化如何巧妙地操縱與獨斷地灌輸人們，並因此可以賦權個人反抗媒體文化產品中的宰制意義並生產出他們自己的意義。

肆、文化研究文本作為課程研究

從文化研究的角度看來，文化是青少年賦予自我及他人意義的場所。青少年某種程度會藉由媒體的再現（representation）而型塑與建構了自身的認同，同時也成為主流社會如何看待青少年的方式。換句話說，不同青少年次文化的自我與社會形成是由流行文化形式，像是電視、廣告、軟性小說、流行音樂與電影等所媒介，而這些都是文化研究的重要關注（Giroux, 1996）。準此，對於青少年學生文化也必須將其置放於由媒體所型塑的文化中來加以理解。

主題文章

尤其到了數位時代，即如 Giroux (2002) 指出，新的電子科技的擴散及互動形式的開展已經改造了不僅是主體性生產的教育學脈絡，也改造了人們如何處理資訊與娛樂的方式。從權力中心所生產出來作為娛樂的是一種新的機構化與商品化的文化；但另一方面，這樣的流行文化卻也提供了反抗主流宰制文化的可能性。尤其是流行文化拒斥高雅/低俗文化的區別，而試著去肯定歷史、經驗、文化形式與快樂的多元性。

Giroux 的觀點指出了在後現代狀況下，文化研究範圍與主題的廣袤性，媒體文化與青少年文化交纏互用不已。一方面，青少年的認同與文化某種程度是由媒體帶動的文化所形塑；另一方面，媒體又作為青少年文化展示與表現的管道與空間，並可能將青少年次文化拓展為文化的一種。這些文化型態彼此之間之交纏也提示了教育必須跨越教材內/外、課堂內/外、學校內/外，方能全面性地與正確地認識今日學生的多元樣態。

準此，若從「文化研究即課程研究」的角度觀之，有關青少年次文化及型塑其認同之媒體文化就應該成為課程研究的重要領域，即如前述《通過儀式的反抗》、《學習成為勞工》、《危機的監控》等，這些研究對於文化研究擴展其方法論與研究範圍有相當大的貢獻，並影響到了教育社會學對於青少年次文化的研究（楊洲松，2004）。以臺灣的教育研究而言，2000 年以來已有不少論文採用質性研究方式研究學生次文化，其中黃鴻文 2004 年採用了 Willis 的研究方法與模式，針對國中學生的次文化進行研究：《國民中學學生文化之民族誌研究》一書是極其重要的研究成果。但這些研究通常被歸類為教育社會學研究，研究者都多為教育社會學者，罕見課程研究領域學者從事此方面之研究。臺灣較多屬於課程研究者，近年來多事媒體素養教育研究，但這方面研究的論文又多屬中小學教師進行之行動研究，較偏重實務層面之問題解決，對於分析與建構相關理論助益有限，尚有成長精進空間。

面對青少年次文化與媒體文化交纏連結的教育狀況，教育者必須反過來將這些當成是教育的重要資源。批判的文化研究與教育學應該要對於媒體文化中的政治再現進行討論，集中到種族、性別、階級與性的影像及討論，但同時亦在更大的社會條件、討論集中將這些批判概念化。換句話說，文化是收編與反抗鬥爭的場域，青少年與其他人在此想像他們與世界的關係。批判教育學與文化研究因此試著給予學生發聲，以接合他們對於主流文化的批評並形成他們自己的次文化、論述、風格及文化形式。

而就媒體與文化研究而言，Hammer與Kellner (2009) 就指出，媒體/文化研究僅僅是更大的文化研究計劃中的一個形態或類別而已。其會發生在高雅文化到流行文化如消費、運動，以及次級文化與文化實踐等。文化研究因此是個

多樣取向、主題、方法、計劃與開放的領域。Kellner與Kim（2009）進一步指出，科技的發展，尤其是電腦及網際網路等新的媒體科技，將會對教育的制度化與知識的單一化產生衝擊與挑戰。透過這些新科技，文化的去中心與互動的參與溝通成為可能，多元的聲音與不斷拓展的資訊流將開創出教育與民主的新領域。尤其是對雙向的對話溝通與群組的多人溝通借由網際網路得以實現。他們進一步認為，像是YouTube等新媒體聯結到了轉化的批判教育學將可以協助實現為了民主與轉化教育學的網際網路潛能⁵。換句話說，整備有批判意識與運用新科技媒體的能力素養，個人可以實現Giroux（2001）所謂的「民主公共生活的重現」。

按照Giroux與Kellner等人的觀點，新的媒體可以開展出一個提供個人完成自我實現與社會轉化的批判性媒體素養教育行動的空間（Kellner & Kim, 2009）：從教育在開展個人多面向潛能而言，YouTube可提供了個人自我表達、增權賦能與轉化能量。以教育作為啓蒙運動計劃而言，YouTube也提供了機會讓個人去展示個人自主、公民德性、政治參與及社會正義的價值。總結而言，發展新的批判性媒體教育學是很重要的，其可以協助學生成為更具積極主動的主體。

綜上所述，若將課程研究視為文化研究，有關青少年次文化與媒體素養教育的研究是當代課程研究的重要領域⁶。

伍、結語

課程研究理論自Pinar提倡再概念化以來，即不囿於任一理論而跨界聯結了各種理論、方法與領域。例如，Doll（2002）即主張採取「後」（post）武器——後現代、後結構、後殖民、後父權、後工業、後福特、後精神分析等，以對抗

⁵ 2010年底發生於北非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及隨後風起雲湧的阿拉伯之春，就可謂之為新科技媒體所實現的。這些革命或改革運動多由網路世代的年輕人運用FaceBook、Twitter等網路串連的方式發起，其影響之深、範圍之廣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關注，從2011年初開始至今尚未完全結束。

⁶ 目前國內課程研究與上述文化研究領域較有交集者多為媒體素養教育，其中多以量化研究的方法及行動研究的方式進行，較少採取質性研究取向，且多數偏向具備正確認識媒體的素養教育，但未達Giroux與Kellner所謂「批判性」的層次；換句話說，多僅是做到「解放」（liberate）但未「賦權」（empower），此為未來課程研究可進一步開發之領域。

主題文章

傳統上控制課程研究的幽靈，來作為課程研究的新典範。至今也有許多成果展現如：後現代主義（Doll）、生態理論（Bowers）、後結構主義（Cherryholmes）等。這些都是跨界的聯結，也都已有豐碩的成果。跨界與連結到文化研究，或是將文化研究領域理解為課程研究領域，也可使課程研究領域更加擴展開來。前述媒體素養教育、青少年次文化研究等也都可作為課程研究耕耘的領域；除此之外，1990年代以來文化研究著重的主題如：認同、種族等也可作為課程研究領域的補充，尤其是課程教學與階級、性別意識形態的研究自 Apple、Popkewitz、Giroux、Bernstein 等人之後已有許多研究成果，但關於「種族」與「文化認同」的研究則方興未艾，課程研究者未來可更加擴展至該領域之研究。

參考文獻

- 周淑卿（2012）。課程美學研究在臺灣：議題與問題。**教育學報**，40（1/2），31-44。
- 陳伯璋（1985）。**潛在課程**。臺北：五南。
- 黃鴻文（2004）。**國民中學學生文化之民族誌研究**。臺北：學富。
- 楊洲松（2004）。**當代文化與教育**。臺北：洪葉。
- 楊洲松（2014）。文化研究的方法。載於林逢祺、洪仁進主編，**教育哲學研究方法：原理、步驟與實例**（頁 211-227）。臺北：學富。
- Bowles, S., & Gintis, H. (Eds.). (1976). *School in capitalist America*.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Doll, W. E. Jr. (2002). Ghosts and the curriculum. In W. E. Doll & N. Gough (Eds.), *Curriculum visions* (pp. 23-73).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Giroux, H. (1992). *Border crossings: Cultural workers and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 Giroux, H. (1994). *Disturbing pleasures: Learning popular culture*. New York, NY: Routledge.
- Giroux, H. (1996). *Fugitive culture: Race, violence, and youth*. New York, NY: Routledge.
- Giroux, H. (1997). Is there a place for cultural studies in college of education? In H. A. Giroux & P. Shannon (Eds.), *Edu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 Toward a*

- performative practice* (pp. 231-248). New York, NY: Routledge.
- Giroux, H. (2001). *Public spaces, private lives: Beyond the culture of cynicism*. Boston, MA: Rowman & Littlefield.
- Giroux, H. (2002). *Breaking into the movies: Film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Malden, MA: Blackwell.
- Giroux, H. (2009). Cultural studies, critical pedagogy, and the politic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R. Hammer & D. Kellner (Eds.), *Media/culture studies: Critical approaches* (pp. 88-106).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Gray, A. (2007). Formations of cultural studies. In A. Gray, J. Campbell, M. Erickson, S. Hanson, & H. Wood (Eds.), *CCCS selected working papers* (Vol.1) (pp. 1-13). London: Routledge.
- Grossberg, L. (2009). Cultural studies: What's in a name? (one more time). In R. Hammer & D. Kellner (Eds.), *Media/culture studies: Critical approaches* (pp. 25-48).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Hall, S. (1978).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London: Macmillan.
- Hall, S., & Birchall, C. (2006). *New cultural studies*.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 Hall, S., & Jefferson, T. (Eds.). (1975).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Hutchinson.
- Hammer, R., & Kellner, D. (2009). From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studies throug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In R. Hammer & D. Kellner (Eds.), *Media/culture studies: Critical approaches* (pp. ix-xlvi).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Hebdige, D. (1979).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Methuen.
- Hoggart, R. (1957). *The uses of literacy*. Harmondsworth: Penguin.
- Kellner, D., & Kim, G. (2009). YouTube, politics, and pedagogy: Some critical reflections. In R. Hammer & D. Kellner (Eds.), *Media/culture studies: Critical approaches* (pp. 615-636). New York, NY: Peter Lang.

主題文章

- Pinar, W. F., Reynolds, W. M., Slattery, P., & Taubman, P. M. (1995). *Understanding curriculu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urriculum discourses*.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Readings, B. (1996). *The university in rui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hompson, E. 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United Kingdom: Victor Gollancz Ltd Vintage Books.
- Tyler, R. W. (1949). *Basic principles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illiams, R. (1958).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Broadview Press.
- Williams, R. (1961). *A long revolution*. London: Broadview Press.
- Willis, P. (1977). *Learning to labour*. Farnborough, England: Saxon House.

Border Crossings and Articulation between Curriculum Studies and Cultural Studies

Chou-Sung Yang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approach, this paper aimed at analyzing the possibilities of border crossings and articulation between curriculum studies and cultural studies. Firstly, this paper laid bare the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studies while dealing with the related issues. Then, it provided the justifications for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border crossings and articulation between curriculum studies and cultural studies. Next, emerging curriculum issues, concerning youth subculture studies and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were discussed.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were made about curriculum studies.

Keywords: curriculum studies, cultural studies, border crossings, understanding curriculum, reconceptualization.

Corresponding Author: Chou-Sung Yang,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Curriculum Instruction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Chi-Nan University

主題文章